

臺灣社會學刊 第31期  
2003年12月 頁153-188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31, December 2003

研究議題討論

# 從「全球化風險」到「全球在地化風險」 之研究進路：對貝克理論的批判思考

周桂田\*

\* 周桂田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02/12/18 · 接受刊登：2003/11/6

## 中文摘要

本文企圖從風險社會理論的角度，思考全球化到底帶來哪些問題視域，構成哪些基本的風險？同時，全球化本身構成風險之內在動力邏輯為何？同時，本文將嘗試性的思考在地學者面對風險問題實踐之認識觀為何，這個面向包括了討論全球在地化意義，並衍生分析全球（普遍）與在地（特殊）相互交盪的全球在地化風險，探討其在方法論上應加以關注的地方。

同時，本文討論比較了工業革命與當代知識／科學（技）／資本所造成相當不同之巨大社會變遷與變動、衝擊與影響，進而指出當代人類進入高科技全球化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控制革命新危機」。在這個分析架構下，進一步嘗試勾勒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面向與其之間的動態關係。

最後，對全球在地化風險的研究認識討論上，本文指出研究者面對不同地區或國家，應注意到非西方社會在長期政治殖民解放後，結構上仍存在新的一波文化、經濟或高科技的殖民，對這些社會而言，論述全球化風險時，豈不應有自我的reflexivity。

**關鍵詞：**工業革命、知識／科學（技）、全球資本、普遍與特殊、控制革命新危機、全球化風險、全球在地化風險、高科技殖民

## 一、前言

本文企圖從風險社會理論的角度，思考全球化到底帶來哪些問題視域，構成哪些基本的風險？同時，全球化本身構成風險之內在動力邏輯為何？第二個重要進路是在這個基礎下，本文將嘗試性的建構全球（普遍）與在地（特殊）相互交盪的風險發展過程，除了探討全球化風險之動態形構（dynamic crystallized），也將凸顯在地化風險的脈絡性辯證（contextual dialectical）意義與問題。

筆者一開始嘗試以風險社會理論為出發點，批判性的檢討與指出其可能衍生的全球化論題與不足之處，並試圖超越與創制更深入的「全球化風險」與「全球在地化風險」解釋意涵與架構。亦即，貝克所提出的世界風險社會觀點，對於日益複雜的全球化過程與風險性，並無清晰相應的理路思維，但卻相當值得延伸發展。我們雖一開始藉助風險社會理論，但將進一步的建構闡析全球化風險的動態成因與運作邏輯，從原有理論格局與界限提出不同的批判認識觀。尤其，將扣緊討論相對於總體全球化之在地、多元、脈絡性的風險意涵。

也就是說，從方法論的角度，筆者將延伸討論全球在地化的風險所牽涉到當地社會特殊、多元之脈絡關係，指出其做為特殊性而延展與全球普遍性交錯激盪的風險意涵。並且，在此將初步借用 Castells (1996) 的「網絡節點」(network nodes) 觀念，指出全球與在地風險之辯證乃同時發生於全球網絡節點之綿密運作與發展，藉以凸出與細緻化在地社會的「節點行動」(nodes action) 將可能影響總體風險的變動。<sup>1</sup>網絡節

---

<sup>1</sup> 在此我借用 Castells 相當有洞見的網絡節點 (network nodes) 觀念，來呈現全球化與在地化風險基本上是相互發動、激盪、辯證影響的關係，無論從哪一節點（地區

點意味著在全球各地遍佈著各種不同形式的組織、單位、機構、媒體或個人，它們代表各式各樣的行動者（agents），網絡式的穿透並聯繫內國與國際間的活動，產生某程度的影響，其特性在於雖不同節點在不同社會有程度不一的重要性（如政黨、媒體、社運團體、宗教組織），但任一節點（行動者）所爆發的事件，依據其發生事件衝擊的大小，可能會迅速透過地區或全球網絡擴散串連發展，由任一在地行動者產生足以影響全世界的風險問題。

## 二、建構「全球化風險」概念

九〇年代以來資訊科技與資訊化經濟的興起，逐步改造全球經濟、傳播網絡、勞動組織、溝通形式，並且衝擊到社會認同之內涵（Poster 1995; Jones 1996; Castells 1996; Rubin & Kaivo-Oja 1999），同時，基因科技的重大突破，為人類社會帶來不可預測的生態、倫理、醫療或社會不平等結果。<sup>2</sup>換句話說，這些超國家形式的政治、金融、經濟、科技、生態、勞動、生產、國際移民等問題，已逾越了舊有民族國家、國民經濟、國際分工架構的邊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它們帶來全球變動的具體

---

或國家）產生風險，將隨其影響的因素能耐（cause capacity）迅速的衝擊到全球各個在地社會，而進一步的發展為不同在地社會發展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例如九一一事件發生之際與後來，無限無量的衝擊到全世界不同在地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而形成更為巨大的全球化恐怖攻擊、文化對立、經濟遲滯、新政治冷戰等風險。

<sup>2</sup> 隨著正崛起不久的資訊社會發展，短短不到二十年，人類文明以基因工程為基礎的生化社會已翩然來臨，其融合了資訊工程技術及社會網絡，形成對當代人類巨大衝擊的變遷，無論在醫學、醫藥、生態、物種、倫理、社會、性別，皆產生巨大風險，具體分析請見周桂田（2001）。

事實和危機，也發展為世界性的風險和挑戰。

面對這些問題，風險社會理論有其關照的基礎點，但仍須進一步的批判與超越，方能提出更清晰與深層的分析概念，因此，讓我們嘗試由貝克的基本觀點出發，並超越性的建構出思考全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現象與解釋意涵。風險社會基本上從對工業社會現代化之批判著眼，主張應揚棄線性的、簡單的「第一現代」（或「工業現代社會」），發展出具自我批判、解決難題的「第二現代」（或「反身性現代」（*reflexive modernity*）），因為工業現代社會所造成之安全不確定性、生態災難已無法再用舊的社會觀點、制度與處理界域來解決（周桂田 1998）。

同時，既有的風險現象在目前全球化的擴散下，已跨越國族、地理邊界和國家解決能力，侵入到世界各地，因此，全球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及社會秩序因全球化事實而面臨更嚴峻的挑戰（Albrow 1996; Giddens 2001:7）。這些在理論基礎上後來衍生為貝克所指出的「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Beck 1997a:140-146; 1999:19）觀點。亦即，根據這個涵蓋全球風險問題的觀點，全球化時代宣告人類各項現代事務及組織形式，進入高度不確定性（*high uncertainty*）、計算性失靈（*uncalculated*）、難以控制性（*uncontrolled*）的風險樣態中，並從單一民族國家的範疇、工業的現代，不可逆轉的發展為全球的風險現代，而形成政治、經濟、科技、環境、文化（認同與倫理）等之世界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理論所關照的全球化問題，是站在第二現代的典範批判第一現代以民族國家範疇及疆域基礎之工具性、線性發展；第二現代本身是出自於當第一現代產生災難、溢出問題的自我對峙、修正的思維。事實上，在風險社會理論的建構中，我們並沒有很清楚或系統性的看到「風險」與「全球化」、「第二現代」與「全球化」問題關聯的闡釋，或

許有人認為貝克（Beck 1999）在討論（批判）全球主義或世界風險社會時已指出方向，但筆者認為相當不足，因其未系統性完整、直接的分析相關理論因素。因此，本文的工作就在於企圖先藉助貝克既有的討論，再進一步深化、擴張全球化（與）風險社會之論述，嘗試建構一較完整的全球化風險概念體系，並檢討風險社會（第二現代）理論的效力。

首先讓我們先從現象來看。

全球化不但是文明發展的趨勢也是挑戰，全球化所構成的分化整合複雜性內涵，由於愈來愈脫離人類解決事務之舊有範疇和制度，也由於其牽涉的變數和不確定性愈來愈高，所涉及的價值爭議愈來愈大，並且必須面臨判斷和決定（解決）要求的時限愈來愈短（甚至要求即刻解決）。因此，其承擔的風險和挑戰也愈來愈嚴峻，因為，人們已失去舊有的控制、計算、操作模式的保障。以資訊科技與基因科技為例，其一方面在全球具有高度安全或道德爭議性，在實踐上充滿價值上的矛盾或兩難，並且決策時間現實上相當緊迫（或已然發生），而其所具有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後果，難以用舊有的社會、政治、經濟模型來測量和彌補；另一方面，它們也表現著風險全球化效應，直接地、赤裸裸的橫撲世界各地，包括全球各地社群認同危機、文化殖民、網路性別歧視、勞動形態改變與失業、全球暖化、生物安全、全球物種危機、新貧窮、跨國移民歧視、新（知識）經濟階級、新（資訊、基因）科技階級、弱勢族群的生存或意義危機等。

換句話說，當代全球化所涉及的具體危機、組織、價值或抽象形式的變動，是立即而明顯的發生於當今（工業、資訊、生化）社會中人們自行製造、自行承受的過程中，亦即，其對各領域所帶來高度的衝擊、挑戰，甚至是不確定的（災難）後果，往往不易掌握。爲了確立與掌握這些發生過程所產生的現象與結構，我認為無法再拘束於既有（世界）

風險社會的一些解釋框架，而應另外就當代全球化發生過程之驅動主軸、邏輯與風險現象，進行更系統性的思考，尤其是我將集中在知識與科學發展上的當代問題，提出我所建構的「全球化風險」(globalizational risk) 概念。<sup>3</sup>

### 三、全球化風險之動態邏輯

全球化風險之動態邏輯為何？指涉的對象為何？並且，其理論論述分析的特殊性為何？從風險社會理論的角度，到底什麼是全球化與風險問題的系統性關聯並不清楚？在理論的視野與水平上，我們又應根據當代社會的變動，提出何種分析範疇與整合補充，發展其闡釋的獨特性？

首先是，當代西方工業社會演化源起於重商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思維，強調民族國家的主權能力和統治範圍，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國富論基本上闡述了強權民族國家的發展理論。因此，工業社會一方面尋求民族國家內社會經濟與制度的進步，另一方面發展對外勢力的擴張和侵略，以確保國家的優勢與強大。此種「方法論上民族主義」(methodologischer Nationalismus) 所建構出之工業現代化的過程和結

---

<sup>3</sup> 「全球化風險」這概念並不同於全球化危機，我基本上仍然同意要從風險社會理論觀點進行更現狀的、更實質的概念發展，因此首先排除其他各種經濟、金融或制度危機理論，因為脈絡相對不同，而筆者也無能力處理這麼大的架構。而「全球化風險」概念又不同於 Giddens 之「風險全球化」概念，後者立意在於風險透過全球化擴散出去，而造成全球風險不可控制的樣態 (Giddens 1990)，相對的，筆者一向主張，風險的產生乃鑲嵌於全球化過程之競爭或科學與知識擴張的結果，因此，全球化發展本身就會生成風險，並且演變為各式各樣的風險內涵，在一次次的全球化運動中不斷辯證發展，而威脅人類。

果，被貝克（Beck 1986）批判為當代風險社會的根源。尤其，其所產生大規模的生態災難和社會不平等風險威脅，已遠遠逾越了工業現代所內含的民族國家發展及疆域邊界邏輯，反過頭來侵蝕與挑戰工業社會之（民族）國家體制的基礎與統治管理能力。換言之，工業現代發展迄今的全球化過程，不僅只產生以民族國家為範疇的風險社會，更崩解的造成了世界風險社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形成挑戰。

而作為工業現代的延伸，此種全球化主張經常盲目的陷入單線演化的觀點，宣揚經濟帝國主義式之世界市場意識形態及新自由主義的想像，強調將全球各地區及各種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皆可納入市場管理的範疇，來極大化其所謂的（經濟）效益功能。貝克（1997b:5; 1998; 1999）抨擊此種假想式的全球化為「全球主義」（Globalismus）論調，其基本上化約了市場自由主義的幻思，掩蓋了各項嚴重的世界危機，替資本投機者、跨國企業、跨國媒體塑造一個「美好的」、「無（關稅、文化）障礙」、「無（國家、社群）保護壁壘」的世界市場。

除了批判此種天真、經濟全球主義式的全球化論調，貝克（Beck 1997b:7-8; 1999）進一步提出的「全球性」（Globalität）及「全球化」（Globalisierung）兩個理念型概念之分類，可暫且作為分類來思考全球化風險問題。

「全球性」概念在貝克的定義中指涉目前全球各種現象及具體危機，而這些具體現實的現象及危機卻逐步擴充並帶全世界走向複雜、衝突、價值相對、組織對立、社會認同解組、生態破壞危機等巨大風險與高度不確定性，它包括了（一）國際間商業活動在地理上的擴增及更綿密的互動，如全球金融市場之網絡化、（二）資訊及溝通科技的變革、（三）人權及民主原則之普遍化要求、（四）全球文化工業席捲各地、（五）後國際與多元中心之世界政治（除了各國政府之外，有更多跨國



組織的力量興起，例如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等）、（六）勞動價格愈來愈低廉而資本愈來愈短缺且昂貴（勞動利潤降低而資本利潤升高）、（七）全球貧窮問題、（八）全球環境破壞問題、（九）地方跨文化衝突問題等，這些實質的危機與發展遍佈全球，並衝擊目前人類的生活、行動或溝通方式，雖然部分命題帶來正向的功能，但由於快速的變遷及新興的問題不斷逾越了舊有的政治、社會機制，造成人類新的生存威脅。

基本上，「全球性」表徵全球各種發展現象、活動、共通價值與風險威脅，而「全球化」概念，對貝克來說，為體現這些現象的動態、辯證之「過程」(process)，亦即，全球化是全球事務網絡相互牽連、互為影響發生的發展現象；為跨國的、跨地域的社會連結發展，其所產生的效應來自各地域的政治、經濟、科技或文化因素，最後亦反饋式的影響並衝擊各個地區（這是否意謂全球化風險同時指涉全球在地化風險過程？）。進一步分析來看，全球化為體現上述（全球性）發展現象的動態（辯證）「過程」與發展「根源」，同時，其本身成了當代時空意義下的運動狀態主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反覆、辯證的建構全球化風險。

上述所討論的這三個概念（全球主義、全球性、與全球化）在風險社會理論中基本上是順著其一貫的批判邏輯演繹而出，僅部分闡釋了其對全球化議題的關照，問題是，我們如何有系統的運用既有風險社會宏觀的批判認識論（如反身性邏輯、自我對峙的行動策略）與批判材料（如環境災難、跨國市場壟斷等全球性問題屬性），來進行對全球化風險的分析，更進而指出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邏輯及主要關聯面向。

這裡要回答本文主要設定的兩個問題，即從上述嚴格批判的風險社會理論出發，當如何思考（一）什麼是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邏輯；（二）什麼是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面向，同時，其獨特性為何。

### （一）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邏輯

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邏輯，在指涉上包含了（1）最初以民族工業國家單位為範疇的發展，並延伸此單一範疇發展所產生的全球性效應，亦即，產生風險問題的動線一方面由單一國家或地區，延展至全球各地；（2）另一方面擴散為全球不同地區多點、多線的運作，由不同在地社會（特殊性）的發展，形成互為動態影響。前者是指問題的產生、災難的範圍與解決的能力，溢出了單一民族國家之疆域、處理權限，發展為全球規模的普遍風險；後者是指當全球各地不同國家或地區，根據其不同在地政治衝突傳統、制度、科學（技）能力與社會監督批判能力，所蘊生的相同或不同風險，同時多點多線產生，並互為交盪影響，而累積為更具規模性的全球化風險。

因此，現實上，全球化風險的發展與上述這兩種發生模式息息相關，或是由單一國家或地區擴散為全球問題，或是在全球不同網絡節點上（network nodes）產生互為動態生成的擴散效果。亦即，全球化與在地化風險的發展是高度網絡式的相互激盪影響。

基本上，當我們思考全球化風險之動態邏輯，可能要回溯到前述啓蒙運動至工業社會之開發主義、進步與控制等工具性思維，包括了（1）知識，（2）科學（技），（3）生態（人類社會平等發展、自然生態環境）等，皆在此種工具理性運作邏輯下為了追求人類的發展、消費慾望，產生了無法控制、彌補的災難後果（Giddens 2001）。

這樣長期的發展結果，在民族國家內造成了重大的威脅，單一國家與社會被迫（自我）對峙重大災難風險的挑戰，因而（根據反身性邏輯）不乏抗議性的社會、環境運動，並興起NGO/GPO團體批判、監督與反省。

然而此種驅使風險的動態邏輯所產生的災難結果或行動效應，從不

會只侷限在單一國家與地區。當全世界各國或地區，群起效仿此種競爭式開發／剝削發展模式，而擴張為全球社會達爾文主義，則全球化風險邏輯更顯窮形畢露，其動態的面向便是呈現在各國經濟競爭互斥、同時產生之問題多線交疊，甚至擴張深化的複雜發展過程中，其端視不同國家或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科技條件與運作結構，因而產生程度不一的風險，但這些風險確有可能相互影響或加值發展為更嚴重的後果。

有趣的是，此種工具理性擴張下所產生的全球化風險，卻逼迫了全球不同社會早些晚些或同步的產生新一波的新社會運動，並且發展為跨國的運動網絡與連線，共同針對某議題進行全球性的反制，例如自一九八〇年來全球各國、區域的反核組織的串連活動，或一九九〇年代新興起的反基因改造食品運動，這樣的現象可以說是符應全球風險社會中另一個動態的反身性邏輯，亦即，跨國NGO/GPO團體動態的結盟、發動全球性的抗議活動等。

從工具理性所發展的行動邏輯上來說，現代社會的發展之基礎，似乎在於當人類在運用複雜知識／科學（技）時，同時能建構制度並隨時反省修正（*reflexive institution*），以維持社會的永續生存（Giddens 1990）；但問題可能更嚴重些，現代人類運用知識／科學（技）所帶來對社會安全與自然生態的衝擊與高度的威脅，不但擴及全球性，並在全球化發展競爭思維中更形惡化，其風險的規模遠超乎工業革命時期之變革。工業革命雖然引發了全球主要地區前所未見的控制革命發展，但其所帶來風險與不確定性與今日相較，似乎是有限的。在今天科學（技）與生產知識遍佈全球，卻隨著世界政經霸權擴張、社會監督／反省能力之有限性，而同時發展程度不一的風險，多元而交疊的反覆將風險擴散到全球，無論是社會或生態的威脅，其本身變成一波波世界各地動態的、累積的、反覆循環的全球化發展過程，而進步與開發主義意識型態

的引擎正是推動這些全球化風險的主要驅動能力。

例如生產全球二氧化碳四分之一的美國拒簽京都議訂書；越南在生產過程中低度管制化學藥劑；中國上海依循美國消費主義模式大量擴建都市交通生活網；台灣對高度有害廢棄物的低度管制與政治萎縮等，這些全球開發主義追求成長極限的例子，除了造成全球生態負擔，更使得各國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衍生了更大的社會安全困境，包括就業、社會平等、社會認同、能源、食物或水的分配危機。

工具理性一旦發展為全球各社會行動的邏輯，反映在不同社會系統間的是，經濟次系統理性與科技次系統理性將獨大化，各社會無論是政治機制與制度的設計，將排除社會理性中多元的文化次系統、倫理次系統、族群次系統等理性的考慮，因此，科技或運用複雜知識的政治決策，將傾向不平衡的發展，並漸而擴散為全球的風險問題。

## （二）全球化風險的動態性面向

全球化風險的動態性面向，因此緊扣在上述之多線、複數、動態邏輯之驅動力上，並經由不同在地的網絡節點迅速串連性的動態銜接而呈現相當多元與複雜的發展，不但從地區擴散到全世界各地，也從全球反匱到個別地區。

而這些動態、辯證風險的核心驅動關鍵，又如上節歷史結構性的分析，在於當代之知識與科學（技）之工具性運用，在人類無限制成長、激烈競爭過程中，社會帶領自己走向不明的、充滿高度不穩定性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資本的擴張與壟斷並非不是全球化風險的驅動關鍵之一，而是當這個遍存於每個發展時期的老問題，即當資本壟斷的巨手伸向知識／科學（技）的競爭場域，將更凸顯知識／科學（技）在世界各地產生優勢與落差等巨大風險。

工業革命初期，知識與科學的突破與應用（例如蒸氣機、電燈或電報），雖然造成社會、經濟或生產組織的大變革，並形塑機器生產動力下之異化勞動關係、凸顯了資本與勞動的緊張關係，但知識與科學在這個歷史階段的生產角色上，較多仍侷限在生產元素中之技術部門意義，雖然其已帶動了如貝尼格（James R. Beniger 1986）所強調的資訊控制與處理之變革發端，但其仍處於萌芽和成長的發展，實際上仍未變為成熟的社會引擎。換句話說，依照貝尼格的分析來看，這些生產知識與科學周邊的社會條件反而是相當成熟的，如商業、金融、保險、運輸和公共事業等物質系統，皆是蓬勃待發的社會條件，它們作為社會大轉型下，驅動知識與科學發展（如蒸汽動力）的社會鑲嵌脈絡（Karl Polanyi 1957），等待了新的知識系統與科技系統的革新，隨而引發巨大變革。<sup>4</sup>因此，工業革命的驅動引擎關鍵，並不在技術決定論眼中的科技（蒸氣機）革命影響一切變革，其主要的主體必須回到上述社會鑲嵌的具體脈絡。我所要表達的意思是，知識與科學的發展與突破在這時期雖然重要，但其應視為人類生產歷史的階段結果，而非最開始決定的成因（雖然其在歷史辯證中又成為相當重要的成因），亦即，知識與科學的突破在工業革命階段變成某種促因，但其歷史的角色在此仍在某個程度上被限制在技術部門，還待繼續成熟的發展，而與今日我們所看待大不相

---

<sup>4</sup> 在貝尼格（Beniger）的論證中，於蒸氣機革命之前的一八三〇年代，商業資本主義已逐漸成熟，其在全世界範圍內確立了物質能量流通的主要基礎結構，包括港口設施、船隻等物質結構，和資訊收集、處理與交換的網絡等非物質結構，這些貝尼格分析中的第三部門（運輸業和公共事業）的成熟相當有助於確立工業革命必要的先決條件，不僅推進了物質（能量）經由系統而得到流通和處理，也增強了分配的基礎結構之複雜性和專門化，惟其關鍵因素，即速度，在蒸汽動力發明前仍無改變（Beniger 1986:201-255）。

同。總的來說，相對於技術部門的變革與資訊控制革命的發端，土地、勞動、資本與商品才是這個時期真正重要的主角，尤其資本與勞動形塑了史上精彩的生產關係，締造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社會不平等性，生產力的來源在於剝削自然資源與勞動商品，擴大商品消費的同時，結合壓榨勞動剩餘而擴大資本，成就一個隨時引爆風險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知識與科學在這時期的突破與應用雖非推動社會變革主要成熟的引擎，但其仍促成了原先社會發展結構骨牌效應式的大變革，其關鍵在於蒸汽動力的發明帶來處理物質系統速度（speed）的改變，進而造成處理其他非物質系統的變革，包括貿易、金融、保險、法律、制度等改變，<sup>5</sup>一八三〇年代當無煙煤作為新的能源出現——蒸汽動力正式取代水利動力，其先運用於第三部門（汽船、鐵路），然後運用到第二部門（工廠生產），極大地加速了整個處理系統，以致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八〇年間，形成了這些運輸、商業、管理、勞動與社會組織的大變革。換句話說，知識／科學（技）這組科技革命於工業革命所帶來之社會變革關係，在這裡清清楚楚的表現為速度的發展，影響到更複雜社會不同系統的大轉型。我們可以想像，知識／科學（技）當時的發展，乃鑲嵌於其既有發展的社會脈絡中，並且有其運作過程的複雜面向（如發明蒸氣機、電燈、鐵路運輸等涉及的資本投資競爭與社會期待），然而，這組關係相對於今日似乎較為單純。我在此想要再強調一次，即工業革命初期所展現的工業資本主義下，知識／科學（技）仍然僅屬於生產元素技

---

<sup>5</sup> 在貝尼格眼中為五大部門的大變革，第一部門為農業、漁業、伐木業、礦業等物質材料部門，第二部門為處理處理產品的製造業，第三部門為前述的運輸業和公共事業，第四部門為商業處理系統，而第五部門為政治、法律、制度與教育等，參照 Beniger (1986:217)。

術部門的角色，在社會關係下，它仍未超越資本與勞動所形塑之緊張社會關係，而這部分已在當代晚期資本主義中形成倒轉的結果。

當代，知識／科學（技）的進展與突破，躍升為人類社會生產元素的關鍵，生產力的來源不再僅僅是剝削自然資源和勞動，而是加入知識與科學（技）的運用，作為企業創新和規劃技術變遷的來源，在一九六〇年代末，資訊科學的應用與相關知識的發展，已為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奠下了基礎，貝爾（Daniel Bell 1973）所分析此種新的社會類型呈現了結構性的轉變，即資訊科技發展在各部門逐漸滲透、並形成了資訊化的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美國製造業部門產值遞減而服務業產值遞增，同時，知識與科學逐漸在工業生產的角色上日益加重，這兩者的應用（包括資訊和知識）成為了後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徵（p.19），因此，後工業社會生產上的討論重點不在於之前工業社會的勞動價值理論，而在於知識價值理論，亦即，技術和科學（已經）成為一個首要的生產力（p.12）。<sup>6</sup>換句話說，知識和科學的應用更加複雜化了既有的生產關係，亦即，生產元素從資本、勞動、土地、資源、市場的序列，轉為資本、知識／科學（技）、市場、勞動、資源、土地的序列，知識／科學（技）取代了勞動的重要社會位置，同時，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在全球化經濟意義下之科技與資本主義競爭，創造了新的市場網絡與資源網絡，並拋開了土地的地理侷限性<sup>7</sup>。進一步的分析，知識／科學（技）

---

<sup>6</sup> 貝爾指出了理論性知識的重要性，他所需宣揚的後工業社會轉型中，理論性知識的具體化（應用化）和物質科學皆成為技術創新的基礎，其具體化就是使的新知識技術的進一步受到重視和研發，並實質的成為經濟或工程上的應用工具。參見 Bell (1973:11-19)。

<sup>7</sup> 在商品生產型態上，知識與科學不但是銳利的生產工具，大大提高生產和競爭，同時變成炙熱的摩登商品。這個發展具有兩個意義，一是它們自身不再侷限扮演生

的歷史社會角色，已非工業革命初期的次要位置，其隨著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脈絡發展，全然的滲透、深入人類生產的各個元素，並從生產元素的演變，如同工業革命般的，延伸到社會各部門與系統（包括組織、教育、制度、經濟、文化、社會等系統）的大變革。不同的是，這次知識／科學（技）的影響與衝擊除了成為造就生產元素的重要關鍵，更成為全球化社會、經濟變遷成熟的推動引擎之一，其與全球資本互為結盟，支配全球未來社會的發展。換句話說，其一方面變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生產主角（如資訊主義、生物科技工業），另一方面，其與資本緊密嵌合而激烈化全球競爭與發展差距，即透過資本密集鼓勵之創新研發，可能形成產業的地區或全球壟斷，這在生物科技醫療與製藥、光電、航太與資訊產業等顯而易見。

知識／科學（技）如何成熟的成為全球、經濟變遷的推動引擎，我們暫且可以以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1996）所論證的全球資訊化經濟來思考，不僅是資訊／數位科技介入社會經濟生產與系統發展的改變，許多生產技術與經濟組織（包括傳統與新型生產單位與機構、運輸流通系統），甚至社會制度、國家官僚實體、醫療系統、教育機構與系統、傳播溝通系統，皆面臨了以資訊化為基礎的革新，而這些乃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技術範型所發展的資訊化狀態，確實的將資訊與知識的處理融入了所有物質生產與配送的過程，因此，所有社會、經濟、生產、組織、市場與管理，甚至各種制度實體的社會轉型意義，首要來自於資訊科技的革命性發展（p.212）。

---

產元素中技術的角色，而是取代土地與勞動的有限性，成為具有無限潛力的生產工具，作為新的競爭利基，普遍化於全球；二是它們自身變成商品來源，不僅在程度上取代勞動、製造性商品類型，也因此改變了勞動的內涵、組織與網絡性格，同時更成為市場上具有獲利性與延展性的商品對象。



同時，在資訊化經濟中，<sup>8</sup>資訊科技革命產生兩股推動經濟生產與社會系統的引擎，除了資訊化（informational）過程外，另一個驚人的效果為全球化。資訊化指單位或行動者（agents）之生產力與競爭力得以有效生產、處理，及應用以知識為基礎（knowledge-based）的資訊（Castells 1996:70），來進行生產或溝通互動；全球化則指在生產、消費、流通與組成元素（包括資本、勞動、原料、管理、資訊、科技與市場）以全球為範圍而組織起來，其效果為不論形式上是以直接的方式，或透過經濟作用者間連結的網絡，來達成此種全球性質的網絡流通。而這些，皆以資訊科技革命所提供的物質作為社會基礎，由知識—資訊基礎涵蓋全球性的網絡，以及由資訊溝通科技革命的連結，產生了這一新的獨特經濟系統。而這一新而獨特的經濟系統，柯司特甚至認為，乃將原先的工業經濟納入其中，工業經濟必須發展為資訊化和全球化，否則將面臨崩解的命運（p.98）。<sup>9</sup>

---

<sup>8</sup> 資訊化經濟最典型的是以資訊／知識為基礎的發展，可以以兩種類型來舉例說明：一是網路經濟類型，包括網路上的資訊商品販售（如電子雞、天幣、網路遊戲軟體）與通路平台化，以輔助傳統商品銷售通路。第二類資訊經濟包括了資訊處理設備與處理資訊過程中的帶來的附加價值，前者為資訊處理機、電腦等設施，後者則涵蓋了處理資訊在各種組織、機構、管理、通路與市場的資訊化過程，其需要處理資訊所需的各項軟硬體，包括工程軟體、組織或機構管理軟體、簡報系統軟體等。顯見資訊化過程創造出從所未有市場價值與商品生產型態，提高行動者的有效生產、處理及應用以知識為基礎的資訊。這些過程事實上造成全球網絡性的變革。例如做為全世界第三大港口的台灣高雄港，面對全世界港口倉儲與運輸的資訊化，必然的需強化其港口內部組織與管理、外部訊息交換與商品資訊處理的資訊化、效率化能力，以確保其全球競爭的網絡節點（networking node）能量。

<sup>9</sup> 事實上，柯司特論證資訊科技革命的發展，不僅僅發展出人類歷史上獨特的經濟系統，而又呈現出全球社會系統變革的端倪，即未來全球將逐步發展為資訊化的社會、經濟系統。

亦即，由上述借用柯司特的論證，我們看到相對於工業革命時知識 / 科學（技）運用（蒸汽動力發展）所帶來全社會與社會與經濟生產「速度」的變動，資訊科技與資訊化經濟所帶來的影響面向就不僅僅是經濟生產與社會系統速度性的變革，其發展凸顯了三個具體方向：（1）全球化層次發展：其超越國家地理界限藩籬、發展成爲具全球規模性質之生產、消費市場、資本、經濟競爭與科技競爭等重要工具，因此，知識 / 科學（技）在當代變爲全球（化）層次的發展意涵；（2）速度變革：全球經濟生產與社會系統產生網絡式的「速度」運作變革（四倍數時代）；（3）內涵變革：全球經濟生產與社會系統發展內涵的變革，部分或全然的改變了生產、商品、消費、組織、管理、通路等經濟生產消費系統，也部分改變了社會系統（如前述國家、教育、醫療、傳播溝通系統）的發展。

如果我們要雞蛋裡挑骨頭的話，可以說柯司特的判斷只對了一半，可能是侷限於他寫作期間的視野，現實上資訊科技革命僅是當代人類運用知識 / 科學（技）的一例，以知識 / 科學（技）爲推動經濟、社會系統爲基礎引擎的除了資訊科技與資訊化的全球效應外，還包括了無數的面向，例如傳統組織或科技的革新、新興生物科技或基因工程的突破、光電領域與航太領域、奈米科技帶來微小世界的誕生，而這些領域無論是傳統科技或新興高科技的發展，皆非單獨自行演繹而出，相反的，它們之間透過知識 / 資訊 / 科學性的連結關係相當密切，例如人體基因工程基因密碼的排序與計算，需結合高度的資訊工程學，而形成新興的基因資訊學發展；奈米科技也能和基因資訊結合，在未來微小化的醫療過程中，進入生物體內進行基因與資訊重構治療；光電和航太領域所需要的也可能不僅僅是資訊工程面向的開發，其和奈米或基因工程的發展可能息息相關；最後，傳統組織或科技所進行創新與變革，更需以知識 /

資訊或科學為基礎加以發展，也可能隨時以上述任一科技進行結合。

我所要說明的是，雖然資訊科技革命目前帶來全球經濟、社會系統的資訊化、生產與社會溝通系統的速度不斷極致化、形成全球網絡化的生產與消費、更造成組織、管理、通路、市場的變革，其他以知識／科學（技）為基礎的經濟或社會系統面向，皆可能帶來相類似的衝擊，柯司特雖然成功的論證了資訊科技之技術範型全面的滲透到所有社會部門的轉型，更帶來全球化資訊化經濟之快速流動，但從社會發展階段而言，這似乎是我們眼中全球愈來愈重視高科技研發、投資之資本主義（global high-tech capitalism）走向的第一步，若再回到貝爾的說法，廣義的新社會轉型著重知識理論與知識技術的應用發展，雖然狹義上我們看到電腦通訊網路所發展的資訊經濟已逐漸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一個現象（Bell 1973:14），也就是說，我們應將洞悉未來社會的發展全然放置在不同知識／科學（技）的發展與影響，而非僅僅只侷限在資訊科技技術範型的社會變遷。

亦即，從當代的眼光來看，新興的知識／科學（技）之應用從不歇止，資訊科技與全球資訊化經濟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值得我們再思索的是，資訊化經濟之後呢？事實上，柯司特論證上所指出資訊科技網絡所奠基與發展的四個全球經濟競爭形式與結果，我認為對其他正發展的高科技工業而言，也同時適用，其並非資訊化經濟的獨特性質，包括了（1）技術能力，科學／技術／產業／社會體系的總體能力；（2）進入大型、整合、富裕市場的途徑；（3）產地生產成本與市場價格的差額掌握；（4）國家與超國家機構之成長策略與操控能力（Castells 1996: 110-112）。這些皆須高額の資本與技術能力、科技發展策略與全球市場競爭能力來配合，而自一九九〇年後至最近的發展，我們同樣看到相類似的現象，（1）知識／科學（技）的應用比重與發展速度，在世界各

國越來越重要；同時，（2）全球資本的集結與合併的大型新興科技企業趨於激烈；（3）新興知識／科學（技）研發應用的競爭，與巨大資本的關係越來越密切<sup>10</sup>；（4）新興知識／科學（技）對經濟、生產、材料、生態、醫療、社會、倫理或族群的衝擊越來越廣、越來越深<sup>11</sup>；並且，（5）其發展與衝擊的速度，形成全球網絡性的意義，相當的快速。因此，這些現象雖是近十年的演變，但非前述資訊化經濟解釋所能完全涵蓋。換句話說，需要評述與確立的，為知識／科學（技）在當代成為推動經濟、社會、文化、倫理或生態變革的重大引擎，接續延綿的對全球產生鉅變的效應。

這些引發全球連鎖性的鉅變，在當代相當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現實上，必然重新牽涉知識／科學（技）與國家（state）、經濟生產、資本累積或壟斷、<sup>12</sup>社會整合（包括階級、性別、族群、倫理）、環境生態與文化的複雜變動，其事實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不確定性，變動的

---

<sup>10</sup> 可參閱馬維揚（1998）；徐作聖（1999）。

<sup>11</sup> 參閱 Oliver（2000）或周桂田（2001）在這方面相關的討論。

<sup>12</sup> 例如柯司特所論證，在資訊化經濟年代，公司是由獲利力（profitability）而非生產力所推動，獲利力與與競爭力是科學技術革新與生產力成長背後的決定因素，因為唯有需求擴張才能降低增加生產力後之風險，因此，開拓與尋求（全球）新的市場是重要的議題，為開拓新市場，資本需要高度移動能力，在全世界進行流通與投資，並且公司因此需提升通訊與資訊處理能力為維持其市場競爭力（p.89）。同時，國家的角色也逐漸變遷，各國特定政治利益影響本國或國境內公司經濟競爭力的表現，國家積極採取介入管制或解除管制，以維持「國家競爭力」，柯司特的說法是，資訊化經濟，包括資訊科技、組織變遷與生產力間的聯繫有很大部分是透過全球競爭來完成，因此，其發展為「高度政治化經濟」，因為資訊化使得成熟工業潛藏生產力得以發揮到極致，國家若不介入，國家工業經濟將會瓦解，無法保持其競爭力優勢，參閱 Castells（1996:98）。

規模、速度和複雜性更遠遠的超過工業革命時期所能掌握或預見的發展。如上述，工業革命（以蒸汽動力為主）啓動了原本已具成熟不同社會部門的再分化與複雜化，然而，這種鑲嵌在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技術革命，雖引發了社會重大的變革、速度化與複雜分化，而其擴散與變革效應和範圍，基本上明顯而立即的發展出一定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如勞動與資本的衝突、階級結構的確立、社會安全體制的興起，並且其問題屬性雖可能擴及全球（馬克斯之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但現實發展態勢仍侷限在民族國家之地域與統治範圍內。相對的，我們所分析當代的發展，資本、知識、科學（技）與國家之結合體所造成全球網絡化擴散、擴散速度的極致化、衝突領域和深度超越地域與國家、而傳統行動者（不同領域之自然、社會與人文科學專家）的職權能力在此部分或完全失效，並且，其在一波波變動中不斷盤旋擴大和纏繞發展，產生的問題與對未來的視域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僅能做短期有限的風險評估或預防，而對整體與中長期問題的風險視域並無法完全歸納或預見，甚至企圖如過去般加以控制。

換句話說，「控制革命」（Beniger）思維所面臨可能失效的新危機，<sup>13</sup>蘊生了「保留權利予開放的未來」（the right to an open future）<sup>14</sup>思潮之興起，亦即，由於人類社會巨大的變動，無論是在科技安全、醫

---

<sup>13</sup> 舉個例子，當基因工程與資訊系統或奈米科技結合時，其中早預存相當多的假設與複雜系統的設置（hypothesis setting），如經過相當多的基因排序假設與實驗的觀察結論、資訊統計學的計算和化約解釋、奈米微小化數學計算的假設與觀察結論，但如果上述的應用結合在操控領域上或醫療實用上出了問題，從操控學（cybernetic）的角度而言，系統的龐大複雜性和偶然性並無法立刻、或甚至無法找出問題所在。而這就形成了新的控制革命危機或控制失效。

<sup>14</sup> 這部分的討論請參見 Buchanan et al. (2000:170)。

療、生態、生殖或動植物改造、優生與強化，由於涉及整體全球社會高度的衝擊與不確定的結果，這一代人們應以保留謹慎的態度來面對這些發展，並保留決定的權利予以下一個或數個世代，而不干涉或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sup>15</sup>

因此，我們如何看待與思考由高科技與資本主義纏繞發展的全球化風險，對在地社會的挑戰？尤其，作為一個在地社會研究者，如何反身性的思考全球化過程所帶來對在地社會之風險威脅？事實上，這個提問涵蓋了兩組亟需釐清的問題，即是在方法論上，討論（1）思考不同在地社會特殊的關係脈絡，如何辯證、發展全球性的風險為在地化過程的風險，是否更多元或深化風險問題；（2）不同社會在地化風險如何反置影響、辯證全球性風險，而出演繹出不斷變動的全球化風險？

#### 四、思考全球在地化風險

在經過前面全球化風險之面向的討論後，我們終將需要同時在方法論上的層次，檢討全球化風險的發生過程所蘊含的「在地化」（Robertson 1992; 1998）發展，並且形成網絡節點式之互為辯證、影響、生成的意義，我們在概念上稱為「全球在地化風險」（glocalizational risk）。當然，我們需就前述高科技工業與全球資本結合纏繞之發展結構，重新的審視其對（與）在地社會的發展關連，這就包含了幾組值得討論的基本命題：（一）風險形成特性及不同風險形成特

---

<sup>15</sup> 以這個角度來看爭議性的複製人問題，則可以推論為：當複製技術未完全成熟，同時社會未能充分討論與接受，不應貿然進行複製人實驗，否則違反保留權利予下一世代的原則；而當複製技術成熟，首先要面對的是是否會造成社會、倫理、族群重大變革的問題，應交予下一世代來進行討論與負責。

性中所具有的全球與在地關係；（二）在地社會的政治、社會特殊的關係脈絡；（三）如何看待這種全球化與在地化過程中互為辯證、網絡節點式

的發展與影響，尤其，在地社會網絡節點的行動問題是否將造成更為深化、多元的與棘手的全球風險。<sup>16</sup>

### （一）風險形成特性

「全球在地化風險」指涉除了全球化所造成普遍性的風險之外，不同在地社會特殊的關係脈絡，將蘊生該社會特有的風險樣態，透過在地網絡節點的行動在某個程度上反饋到全球層次的風險。問題是，為何在地的社會關係脈絡將影響、甚至變異全球普遍化的風險內涵？

這個問題牽涉到風險形成的特性，及因之所發展出的在地（特殊）與全球（普遍）風險交盪的內涵。風險一方面可說是實在論（realism）的客觀存在問題，另一方面又屬於開放發展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過程，在兩者的拉扯辯證中，它形成於依實在知識所認知之開放的社會脈絡中（Beck 1999:147），<sup>17</sup>並同時將牽涉到不同社會制度與行動、政治衝突文化、社會價值、公民社會傳統等「在地實踐經驗」（Wynne 1996:62）面向的發展。

---

<sup>16</sup> 如三大全球化風險（生態、新社會不平等、市場壟斷），這部份的現象可參考 Soros (1998)；Held (1998)；Paul and Thompson (1998)；Kennedy (1999)；McGrew (1998)；Beck (1996)；李碧涵 (2000)；林志鴻、呂建德 (2001)。

<sup>17</sup> 在這個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的拉扯過程中，「風險是人為的混合（man-made hybrids），其包括並結合了政治、倫理、演繹、大眾媒體、科技、文化定義及人們的感知」（Beck 1999:146），因此，總體而言，風險依賴社會上人們的文化感知和定義來建構它。

因此，當社會在定義（建構）風險時，相當著重於理解風險的在地「知識」（risk knowledge）（Beck 1999:144），而由此對風險認知、討論的傳統（特別要面對新事務、新科技的風險）則鑲嵌於這個社會批判、溝通及政治論述的網絡或傳統。它可能是隱藏風險溝通、批判對話的政治傳統，也可能是公開辯論、感知與政治衝突的風險社會傳統，而這兩者皆透過不同網絡節點（包括政黨、媒體、社運團體、文史工作室等）的行動或不行動，影響在地社會的風險對策與管理，而可能進一步的發展為反置全球化普遍性的風險問題。

## （二）在地社會的政治、社會特殊的關係脈絡

補充的說，每個社會及其制度背後有其獨特的形態與運作的邏輯，而其乃深植於該社會某種文化及歷史傳統或事件，形塑出當地的文化、政治衝突模式及公共領域批判的習慣（酒井直樹 1998；Appadurai 1998），因此，普遍性的風險進入某在地社會的過程，就必須面對通過該社會特殊政治、制度、文化、衝突關係的洗禮，而發展為從在地社會脈絡出發詮釋、建構的風險。

這些地方的關係脈絡，決定了人們對風險掌握的知識（溝通）空間，在某個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對風險問題的透明化、制度化及符合民主程序的走向，因而影響了解決風險的時程和進度（「風險時差」（time gap））。這裡當然存在著此種理論預設，即當一個社會更公開、透明面對風險難題，則透過制度性的機制，將降低風險的門檻，因為在公共的論述過程，無論透過媒體、不同領域專家、門外漢的日常訊息傳遞，社會皆可藉此進行學習和溝通，而逐漸掌握風險知識的輪廓，進而發展民主參與的風險溝通能力。反之，當一個社會的風險批判、溝通未能公開化、制度化，而由社會中某些部門（如經濟部門）宰制風險的論述，則



風險將「隱匿」的成爲人們恐懼的「怪物」(monster)，在社會流傳與擴散 (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sup>18</sup>

基本上，任何在地社會對風險衝擊的規模和再生產，除了端視其風險知識的溝通空間，更應反過來探討決定、定義風險和風險知識的社會關係脈絡。我在此所稱在地特殊的社會關係脈絡，爲相對於其他社會所發展出該地社會運作上延續的結構、內涵或傳統所建構出的社會事實，其基本涵蓋了制度、國家、經濟系統、科技系統、政治文化、公民社會傳統與媒體等（網絡節點之行動）面向，並且關鍵在於端視這些系統互動中所發展的關係結構。<sup>19</sup>

尤其，在全球重視高科技之資本主義趨勢下，不同先進工業國家雖然長期上皆具有較成熟的制度與公民社會傳統，但在經濟系統的驅動下，逐漸呈現鬆動的政治批判與制衡能力，或者，在國家科技發展策略下，國家所主導的科技工業與全球化經濟競爭佈局，往往強勢的瓦解了其在地社會的其他次系統理性，而形成新的社會、政治關係。

在同樣的歷史條件下，許多後進國或發展中國家所形塑的（在地）社會關係脈絡則顯然較爲複雜。

---

<sup>18</sup> 參照貝克所摹擬的風險社會「法則」('law' of risk society)，應更爲明白：「當一個社會愈少公開承認風險，將因之產生更多的風險」(Beck 1999:144)。

<sup>19</sup> 而無論是先進工業國或後進發展國，其所產生不同之在地特定的社會關係與自主性支配著一定的社會運作邏輯與風險的建構發展，因此，在此社會關係中誰支配風險論述、誰操控風險責任的歸屬與政治、誰從中牟取利益、誰製造風險、誰是潛在的受害者、媒體認知操縱之政經關係誰生產風險知識和製造無知等，都是非常重要觀察的過程。通常在一個科技官僚集權式的國家，通常崇尚經濟發展的競爭利基想像，而刻意忽略或製造風險的「無知」(unawareness)，延宕解決風險問題的契機，形成某種程度的惡性循環，因而演變爲一定時炸彈，隨時引爆更大的風險。

首先，這些社會工業化的歷程經常壓縮於短短數十年，而高科技工業發展的時間更為短促，因此，在科技移植的結構下，對高科技發展的反省及社會批判、溝通能力，由於公民社會傳統仍處於萌芽期，<sup>20</sup>顯得相對的無力。

其次，這些國家內政治、經濟、文化與（高）科技的發展，長期就受到霸權國家的影響或支配，而呈現不斷追趕、後進學習的關係，然而這樣的過程卻呈顯爭議性的發展，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與文化權力結構的不平衡發展，並且其社會關係與發展脈絡在全球高科技經濟競爭的推波助瀾下，更容易導向政治經濟系統獨大，而社會與文化系統之批判理性的弱化。

也就是說，在地社會所可能蘊生自主、批判之公民社會，在此雙重結構下，即（1）後進發展國的被支配位置（王振寰 1999）、（2）全球重視高科技之資本主義的競爭，仍未產生足夠的能耐（capacity）、知識與策略來加以對抗。亦即，相對於先進國工業國家，後進國或發展中國家之社會關係脈絡所發展出的社會自主性相當特殊，換個說法是，其社會自主性能力相當薄弱，甚至在不同風險動態發展過程中，被掩蓋於某些支配關係中。

以台灣在地社會為例，自八〇年代以來的環境政策即屈服於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曾華璧 2001；林崇熙 1989；紀駿傑 1998），而地方民眾環境抗爭並未形成跨區域、全國性的批判社會傳統（蕭新煌 1994），而這樣所形塑而成的公民環境權感受卻是隱性的、長期忍耐而後爆發區域抗爭的（李丁讚、林文源 2000）。此種屈服於經濟邏輯、有限及隱匿風險的社會傳統，更顯現在對高科技風險無力批判、反省與溝通的在地社

---

<sup>20</sup> 關於台灣公民社會弱化結構性格請參見顧忠華（1998）。

會問題中，一方面是缺乏政治壓力導致放任鬆弛的風險管理（周桂田 2000），另一方面是公民社會與公眾對高科技風險複雜性的無知，而無法發動監督與批判的能耐、知識與策略，致使風險不斷被隱藏而形成更大的危機（周桂田 2002）。而此種在地社會缺乏對風險的批判能力與傳統，也導致在地環境制度建構的困境與兩難（黃錦堂 1994）。

（3）如何看待這種全球化與在地化過程中互為辯證的影響，尤其，後者的發展是否將造成更為深化、多元的與棘手的全球風險

從全球的眼光來看，每個社會特定的生產與運作邏輯，包括上述所提出的政治、社會衝突文化與溝通體系所發展出的風險認知皆有一定程度的變異性，而當其變異性相當明顯或過於巨大時，將影響到全球普遍性的風險，後者因為在某程度上依恃各個在地社會的實踐。換言之，在此所強調的全球化風險，除了風險的效力普遍公認（如科學家）及於全球的第一個層次之外，也涵蓋了（普遍性）風險在各地區的實踐形態將反饋全球，而產生另一波的全球化效應。如從生態風險的角度，某些貧窮國家因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延誤了重大的生態災難，並釀成更嚴重情形而擴散到更廣的世界各區域（Beck 1996a:133）。

事實上，以上的闡述並不意謂著全球在地化風險的變異只存在於後進的國家，或指涉後進國家一定具有較「落後」的政治社會制度，因為風險在地化指涉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因該社會自我特殊的關係脈絡，將衍生不同或程度不一的（在地）風險，而影響或衝擊全球普遍性的風險。

例如，就先進國家崇尚開發主義而言，在全球暖化的議題上，美國柯林頓政府或甫上任之小布希政府，皆因涉及該社會經濟生產之全球利益，而延遲或拒絕簽署並履行「二氧化碳公約」；<sup>21</sup>在基因科技風險化

---

<sup>21</sup> 蕭羨一（2001.11.11，中國時報）。

風險上，以美國、加拿大為首的國家，至今仍拒絕簽署2001年甫通過之「生物安全議定書」，任生物污染風險持續存在。

全球在地化風險的命題對後進國家而言，是特別的複雜。確實大部份的後進國家在制度上不健全，導致風險的擴大甚至波及全球，但這樣的現象並非偶然，而是其長期處於後殖民社會的歷史結構因素，無論是政治、經濟、科技、媒體與意識形態，皆受到西方社會持續性的影響或支配。此種歷史結構位置使得後進的社會發展出弔詭的現象，一方面她不斷的（被納入）以西方工業社會的模型為學習、追趕「現代」的對象，然而本身卻缺乏這些制度、科學（技）或思想長期的社會演化批判基礎及哲學，而無法長期建構具系統監督批判的公民力量。

另一方面，後進社會本身特殊的政治、社會、文化關係及傳統脈絡，又不斷「拼湊」式的「融合」（或「摻雜」學習）工業現代化的發展，而生產出其社會特殊的「現代」樣貌，即其社會相當模糊的、自我模倣的發展擬似於現代資本主義市場與消費社會（semi capitalism market and consumer society），卻乏於警覺其社會自主或傳統文化漸漸消融於全球優勢文化、帝國主義文化的滲透，因此無論是大部分傾向模倣「西方社會」的知識階層或一般民眾，在公民社會系統的建構上無能力產生強而有力的批判傳統，而視許多帝國支配意涵的文化或商品之流通為理所當然，在制度上乏於設防帝國文化支配。例如歐盟各國決議影視商品的傳播，必須達到播放其在地文化影視商品40%的比例，以保護其文化工業與文化價值延續性，而台灣對近日宣布外國影視商品的進口無設限比例。

因此，全球在地化風險命題就分析後進社會之地方與全球的關係，顯得相當的棘手，因為其現代的經驗（自主性）較為特殊，如某些領域較為進步（甚至超越工業國家，如拒煙法案）或落後，某些僅具有形式

制度而缺乏實踐精神或實質內涵，而其社會自主性相對地少了生成現代科技、經濟、工業社會的歷程，產生了擠壓、快速摹仿西方社會的變異結果。也就是說，後進社會所凸顯之全球在地化風險將更形複雜和重要，因為全球多數人口生存在非工業先進國家，而主流的西方社會及制度論述卻仍長期享有其解釋全球的霸權地位，其結果是，相反的掩蓋了（其他）多元地區風險發展事實及問題。

全球在地化風險既然打破了先進（工業）／後進（發展）社會的邊界，意謂著任何地區的社會、政治關係脈絡主宰著該社會的風險發展與利益邏輯，進而產生在地特定的風險內涵，並辯證性的影響全球各地區。在這種辯證關係中，全球是地區的綜合體，先進社會之風險形態僅是一種特殊性，相對於後進社會的風險特殊性，前者並不優於後者；相反的，先進工業國可能因其利益邏輯而相對在某些問題上自我蒙蔽，從其產生更大的全球風險影響。

## 五、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兩個面向的問題，一為何謂全球化風險，其從風險社會理論之角度如何來分析全球化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衝擊與挑戰；二為如何將全球化風險之問題意識配置在具有多元、特殊意義之在地社會脈絡，並思考其所形構各種不同風險社會，將產生出何種與西方社會發展模型不同之社會實踐內涵，進而在肯定全球化過程中，將發展出何種變異、多樣、特殊的現代性。亦即，全球化動態過程中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環境的演變，將不斷扣緊於在地社會關係脈絡，而發展出多元的風險社會，我們可稱之全球在地化風險社會。

任何在地的社會目前所承載、生產、面臨全球化發展，似乎毫不避

免的被納入全球動態的網絡中，問題是，現實上世界政經霸權結構所主宰的全球發展，雖然深具強勢文明歷史意義，卻無法取代或主導任一在地社會的演進。由文中討論發現，全球化網絡是由各在地結點動態牽制，因此，其打破了富國／窮國的藩籬，在動態的牽制、互動中，各方勢力齊出，而經常演變為多重陣營的角力，時而回到全球南北陣營的議題對立，時而由出現第三世界結合歐洲聯盟企圖牽制某工業強國，或全球NPO/NGO組織不分國界的串連以對抗全球化，而全球風險則深植其中，端視各網絡勢力的角力結果。

最值得思考的，當然是在地社會脈絡所建構的風險問題，將如何回饋並再生產全球化風險。事實上，全球化議題已割裂了傳統的歷史聯盟，如歐美聯盟、工業強國聯盟、第三世界聯盟，不同社會根據其意識形態、經濟或政治利益，對全球議題做出不同的判準，最明顯的當然是經濟和環境議題的對峙，因此，可以推定的是全球化帶來的是重新的競爭、合作關係，而對全球秩序重新洗牌，也重構了全球風險的內涵。

對非西方社會而言，這可能是一個歷史契機，在全球新的網絡聯盟中發展出多元的利益關係，而暫時脫離被殖民的歷史位置。然而，非西方社會的風險將相對的增大，一方面在資本、技術與權力不平等結構下，被迫快速的迎接全球化的衝擊，另一方面社會本身傳統意義不斷流失、經濟結構迅速的轉型、而社會和環境安全思維與制度建構卻往往應付不及急速的變遷挑戰，因而造成更大的經濟、社會、生態、人文的風險。重點在於，這些地區佔有全球多數的人口和地理疆域，其問題的延宕和風險的引爆，將遠遠超過目前工業國家主流社會科學的視野，而進入更不可預測、高度複雜的多重危機中。

### 作者簡介

周桂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專長領域包括基因科技與社會風險，全球化與社會變遷，科技與社會制度研究，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等。

## 參考文獻

- 王振寰，1999，〈全球化，在地化與學習型區域：理論反省與重建〉。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4:69-112。
- 李碧涵，2000，〈市場、國家與制度安排：福利國家社會管制方式變遷〉，「全球化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社會學年會，台北。
-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113-206。
- 林志鴻、呂建德，2001，〈全球化與社會福利〉。頁193-242，收錄於顧忠華主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台北：巨流。
- 林崇熙，1989，《台灣科技政策的歷史研究（1949~1983年）》，清大歷史研究所科學史組碩士論文。
- 周桂田，1998，〈「風險社會」中結構與行動的轉軸〉。《台大社會學刊》26:99-150。
- 周桂田，2000，〈生物科技產業與社會風險——遲滯型高科技風險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75-119。
- 周桂田，2001，〈基因科技風險與不確定性〉，發表於「張昭鼎紀念研討會」，張昭鼎紀念基金會。
- 周桂田，2002，〈在地化風險之實踐與理論缺口——遲滯型高科技風險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5:69-122。
- 馬維揚，1998，《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實證研究》。台北：華泰。
- 徐作聖，1999，《全球化科技政策與企業經營》。台北：華泰。
- 酒井直樹，1998，〈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問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205-235。

紀駿傑，1998，〈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西方主流「環保」關懷的政治經濟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1:141-167。

黃錦堂，1994，〈德國計畫裁決程序引進我國之研究——我國重大開發或設廠案許可程序改進之檢討〉。頁307-364，《台灣地區環境法之研究》。台北：月旦出版社。

曾華璧，2001，〈概論台灣環境政策的發展（1950至1980年代）〉。頁48-94，《人與環境——台灣現代環境史論》。台北：正中。

蕭新煌，1994，〈台灣地方環保抗爭運動的性格與轉變〉。頁550-573，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編，《環境保護與產業政策》。台北：前衛。

顧忠華，1998，〈民主社會中的個人與社群〉。收錄於殷海光基金會主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

Albrow, Martin, 1996, *The Global Age*. Polity Press.

Appadurai, Arjun, 1998, "Globale Ethnische Räume." Pp.11-40 in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edited by U. Beck. Suhrkamp.

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n andere Moderne*. Suhrkamp.

Beck, Ulrich, 1996, "Kapitalismus ohne Arbeit." *Der Spiegel* 20:140-146.

Beck, Ulrich, 1997a, "Die Eröffnung des Welthorizontes: Zur Soziologie der Globalisierung, Herausgeber-Mitteilung." *Soziale Welt* 47:3-16.

Beck, Ulrich, 1997b, *Was ist Globalisierung*. Suhrkamp.

Beck, Ulrich, ed., 1998,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Suhrkamp.

Beck, Ulrich, 1999, *World Risk Society*. Polity Press.

Beniger, James R., 1986, *The Control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俞灝敏、邱辛曄譯，1998，《控制革命——資訊社會的技術和經濟起源》。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高銛、王宏周、魏章玲譯，1995，《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Buchanan, Brock, Daniels and Wikler, 2000, *From Chance to Choice—genetics and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ers. (夏鑄九等譯，1998，《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
- Douglas, M. and Wildavsky, A., 1982, *Risk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
- Giddens, Anthony, 2001,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陳其邁譯，2001，《失控的世界》。台北：時報。)
- Held, David, 1998, “Die Glob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Pp.134-168 in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edited by U. Beck. Suhrkamp.
- Jones, Steven G., 1996,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Cybersociety-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edited by Steven Jones. Sage.
- Kennedy, Paul, 1999, 〈「全球化經濟」未來的隱憂〉，中國時報，1999/2/12。
- McGrew, Anthony, 1998, “Demokratie ohne Grenze?” Pp.374-422 in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edited by U. Beck. Suhrkamp.
- Paul, Hirst and Thompson, 1998, “Globalisierung?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Nationalökonomie und die Formierung von

Handelsblöken.” Pp.82-133 in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edited by U. Beck. Suhrkamp.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1999，〈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

Poster, Mark, 1995, “Postmodern Virtualities.” *Body and Society* 1, 3-4, Nov. 79-95.

Robert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London.

Robertson, Roland, 1998, “Glokalisierung: Homogenität und Heterogenität in Raum.” Pp.192-220 in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edited by U. Beck. Suhrkamp.

Rubin Anita and Kaivo-Oja Jari, 1999, “Toward a Futures-oriented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9(3):349-371.

Soros, George, 1998,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聯合報編譯組譯，1998，〈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台北：聯經。)

Oliver, Richard W., 2000, *The Coming Biotech Age*. McGraw-Hill. (曹國維譯，2000，〈生物科技大未來〉。台北：McGraw-Hill。)

Wynne, Brian, 1996,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Pp.45-83 in *Risk, Environment & Modernity*, edited by Scott Lash and Szerszynski Bronislaw. London: Sage.

## **From Globalizational Risk to Glocalizational Risk: Critical Rethinking of Beck's Theory of Risk Society**

Kuei-Tien Chou

Assistant professor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risk socie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how and which risk problem/horizon will be taken in the globalization, analyzing what is its inner driven logic that constructs different risks. Moreover, this article will indicate the thinking ways of confronting risk and academic practice by local scholars, that is, it embraces the discussion of g-localization generating the inter-dynamic g-local risks through global (universality) and local (particularity) development.

Secondl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hardly like grand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s, impacts and influences for the future society betwee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entangled developments of knowledge/science(technology)/capital. It takes evidences that the modern high-tech society combined with global capital flowing brings about "new crisis of control revolution" emerging high global risk society. I will therefore try to outline three dynamic globalizational risk dimensions and their vivid related developments.

Finally, for the research epistemology about g-localizational risk,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practical researcher facing the different local fields should recognize the given structural conditions, like as new cultural, economic or high-tech colonized processes, in the non-western societies after their emancipation from the long colonies of western societies. It is to say, for those societies their local scholars may create their risk reflexivity in order to deepen and reform their risk problems.

**Key Wor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knowledge/science(technology), global capital flowing,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new crisis of control revolution, globalizational risk, glocalizational risk, high-tech colonization